

## ◆思想者营地

## 屈原的生辰

易重廉

研究屈原的生辰,根据只有屈原写在《离骚》里的两句话:“摄提贞于孟陬兮,惟庚寅吾以降。”

何谓“摄提”?东汉王逸引《尔雅·释天》说: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。”战国时期,人们以岁星(即木星)的运行纪年。岁星绕太阳一周约十二年,以十二地支表示,属寅的那一年名摄提格,简言之,就叫“寅年”。

何谓“孟陬”?孟,开端。陬(zou),正月的别称。楚用夏历,夏历正月照例属寅,故正月又叫“寅月”。

何谓“庚寅”?古人计日也是用干支的,属“庚寅”的一天就叫“庚寅日”,可简称“寅日”。

总起来说,屈原生于寅年、寅月、寅日,“三寅”重叠,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。

屈原的生辰,真正推算起来,其实很麻烦。请比较一下各学者推算的屈原生辰——

清人刘梦鹏,推算屈原的生辰为楚宣王4年正月;曾耀湘推算为楚宣王15年正月;邹汉勋推算为楚宣王27年正月廿二,陈暘认同此说。今人郭沫若推算为楚宣王29年正月初七;胡念贻推算为楚宣王17年正月十三;汤炳正推算为楚宣王28年正月廿六;浦江清推算为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;陈久经推算为楚威王29年;潘啸龙推算为楚宣王30年。推算全同的仅仅一对,即邹汉勋与陈暘。

1953年,“世界和平理事会”推举4

位在全世界公开纪念的“文化名人”,屈原是其中之一。屈原的生卒年月日,用的是郭沫若先生的研究成果。当然,不是说郭的推算最正确。谁最正确?俟诸异日也。

屈原的“生辰”问题,不少还正在探讨。比如,“摄提”怎么理解,目前仍有异说。南宋朱熹说:“星名,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。”北大教授林庚先生的理解就是这样的:“摄提”说的是“一年里的季节”,而不是“年份”,就是说“季节正在正月”。林教授还说“摄提与摄提格”,古籍从来绝不混用。但是,我查《史记·天官书》,好像“摄提”与“摄提格”,有时就是混用的。所谓“绝不”,恐怕未必!

屈原生辰的“三寅重叠”,是《离骚》里两句诗的三个“关键词”所决定的:一曰“摄提”、一曰“孟陬”、一曰“庚寅”,缺一不可。著名的彝族学者刘汉尧先生称,彝族人用的是“母虎日历”,而“虎”在汉人心中一直与“寅”相配。于是,屈原生辰的“三寅重叠”,忽然之间,便改变为“三虎相聚”了。不过,有人给我点破:龙虎相得,应该是吉祥无疑。如果是“虎狼成性”,给人带来的那只能是一种灾难了!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载:“秦昭王与楚婚,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,屈平曰:‘秦,虎狼之国,不可信,不如毋行。’怀王卒行,竟死于秦而归葬。”古“天狼星”的分野在秦地,故秦向有“虎狼之国”的凶称。刘先生把“三寅重叠”改为“三虎相聚”,屈原地下有知,恐怕是不会接受刘先生这份厚礼的!

关于屈原的生辰,著名楚辞学家萧兵先生也发表过自己的高见,在其《楚辞的文化破译》一书中称:“摄提:日神星。”又引《尔雅·释天义疏》曰:“陬者,虞喜以为陬訾是也。”称“陬訾”即月神星。“摄提贞于孟陬兮”,简单说就是:日与月,或太阳与月亮相会。日月同庆,屈原的生日,当然是大大吉祥的日子啰!

萧先生的“屈原生辰观”,已经完全脱离了“三寅相重”的传统思路。“岁星绕太阳运行”,一变而成了“太阳”本身。“路”走得太快……自然也无法产生多少说服力。我在萧先生的大作前,写了一句话:萧的文章,挥洒有余,严谨不足。萧先生其慎思之!

历史有不少巧合,不足为奇,但也应该注意。

第一件,共工氏作乱,帝啻使重黎诛之不尽,帝啻以“庚寅日”杀重黎。有人说:“庚寅乃不祥之日,怎么屈原就碰上了,难怪这么倒霉!”

第二件,秦孝公与屈原都出生在“正月庚寅”这个日子。秦孝公用商鞅变法,一路顺风。屈原佐楚怀王变法,为什么就路路不顺呢?

名人的生辰,研究研究,未尝不可。但愈研究愈玄乎,愈玄乎愈不可理解,这就实在大可不必了!

(易重廉,曾任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)

## 见证

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 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

## 身边的变化

刘运喜

我1992年大学毕业后,被分配到邵阳市工作,转眼已经三十余年。

作为一个在邵阳市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的市民,对于邵阳的变化,感受尤其强烈而深刻。特别是近些年来,市委、市政府持续开展争创国家卫生城市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,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环境持续改善,向好向优,老百姓有口皆碑,赞誉有加。

依我个人的观察和感受,其变化主要表现在:

一是城市道路和桥梁的变化。路越来越宽、越来越平、越来越直,出门越来越好走了。雨天一身泥、晴天一身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除了原来的邵水桥、东瓜桥(又名东风桥,即现在的青龙桥)、资江一桥外,新修了资江二桥、余湖桥、西湖桥、雪峰桥、桂花桥、桃花桥等,桥越来越多,越来越漂亮。无论大街还是小巷,都实现了道路硬化、绿化、亮化、美化。

二是城市市容的变化。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干净、越来越卫生、越来越美丽,生活在邵阳

的幸福指数连年持续攀升。市民素质也不断提高,乱丢乱扔乱吐乱倒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,大街小巷都是干干净净的。邵阳成功创建了国家卫生城市,有力提升了城市地位与品位。

三是市民安全感显著增强。近年来,市委、市政府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,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,在全国创举了“一村一辅警”制度,有力打击了违法犯罪活动,维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,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显著改善。

此外,随着国家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、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,无论城镇职工还是乡村农民、社区居民,都有了医保或农保。只要按规定缴纳,生病住院、门诊都能按比例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,看不起病、住不起院、因病返贫现象大大减少。

改革开放几十年来,邵阳的变化是全面的、深刻的、显著的,生活在邵阳的每个人都有颇为强烈的切身体会。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今日强大之中国,也没有今天快速发展变化的邵阳。

(刘运喜,邵阳学院教授)

## ◆史海钩沉

## 闲话白仓

阿旧

白仓镇位于邵阳县东南部,东邻五峰铺镇,北依塘渡口镇,西接塘田市镇,南交东安县大盛镇,为邵阳县重镇。此镇原隶武冈,清时分属武冈州紫阳乡的白仓团、董木团、谭俊团及水津团,1949年属四望乡,1950年划属邵阳县。

白仓镇在古时属武冈、邵阳、永州三地交界地带,位置极重要,明代置有白仓堡,有官军戍守。清乾隆年间新宁石门巡检司移驻白仓,分辖沿滩、白仓、水津、杨清、黄塘、董木、谭俊、大陵、屯田、蔡桥、王亭、金称等十二团(今俱属邵阳县),为武冈东部要津。

境内有四尖峰,又名四峰山,居邵阳、武冈、祁阳、东安之间,西起于河伯岭,南及东安,磅礴突兀数十里。唐述瞻记云,此山从紫云山越郭家岭向左,有一支奇峰突起,到山巅又歧分为四,故名四峰山。明万历年有蒋姓人对应四峰,雕了四个石像,“立庙以安之”。山高九里,绵延四十余里,“为白仓诸山之尊”。光绪《邵阳县志》亦称,这一带的山峰“杰出以百数,惟此山最高,登之可望四州县”,故又名四望山。四望山“地深险最,易藏奸”,道光《宝庆府志》以为,宋时武冈军所立的塘儿寨在“塘田寺(今塘田市镇)”,即以抵御“河北四望山盗贼”。光绪《邵阳县志》载“尚贤都(今邵阳县五峰铺镇、罗城一带)”有“花街堡”,修筑于明嘉靖十二年(1533),也是为了防御“四望山贼”。

《元史》载,至元二十五年(1288),湖南人詹一仔,诱使衡阳、永州、宝庆、武冈等四地民众,啸聚于四望山反元,官军久不能平。后刘国杰破之,斩杀首盗,余众皆降。刘国杰采取宽怀政策,依其所籍之地分置为三屯,即“衡州之清化、永州之乌符、武冈之白仓”,把这些投降的人安置在这三屯,每屯五百人,白仓屯有田“八

十六顷九十二亩”。这样,既可以让他们安定垦田,又可以防止他们造反。元代陈旅《题蒙泉吏隐图》诗云,“豪蛮尽戡戎垒立,甯卒复还农亩开”,所言正是此事。清武冈州屯田村有“故元屯田”,为今塘渡口镇的石桥、桂花、五星一带。

河南濮阳胡村乡亦有地名白仓,传因春秋时卫灵公太子蒯聩在此建粮仓,由白姓人掌管,后成村落,故而得名。而邵阳县地名白仓的仓,也因此地曾建有粮仓而来;而白字,则指粮仓的颜色——这个粮仓四面内外都用石灰粉刷成白色。《湖南省行政区划大典》称这个“白仓”的建造时间在明末,但据以上《元史》所载元代已有白仓之名,可见这个说法并不对。

尹敬中在《邵阳地名源流》中把这个时间提前到宋代,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。白仓镇有裔岩,内有诗刻。据清郭嵩焘《湖南金石志》及同治《武冈州志》等载,裔岩诗刻有两处。一处为权提点荆湖南路公事张绶“被旨招捕邵永蛮寇”后,游览于裔岩所题,时间为元祐四年(1089)三月十二日。一处为何扬祖在招捕邵阳、永州、武冈三境之“妖寇”后,游于裔岩次何扬祖前韵作诗,时间为南宋“咸淳戊辰(1268)”年的九月,末题:“提师招捕,歼厥渠魁……九月,师次白仓,游裔岩。”可见此时已有白仓之名。

据道光《宝庆府志》等记载,四望山外,白仓屯还有莲花山与金华山,金华山上有昆庐寺。南宋末学士罗宗之曾徙居于此山下,建“永慕堂”。又有金华山仓,可贮谷1212石多,在武冈州算是大仓。有白仓市,分三条街,为正街、横街与转龙街,是武冈州东乡较为繁荣的大集市。

(阿旧,新宁人,学者)



▲资江腾龙 张青龙 摄

## ◆煮酒论史

## 宋代武冈州官牟巘

杨运焰

宋代在武冈任职的牟巘,是第一个在武冈留下文字的州官。

据《陵阳集》等史料记载,牟巘,字献之,宋宝庆三年(1227)出生于湖州,卒于元至大四(1311)。牟巘进士出身,官至大理少卿,入元不仕,闭户三十六年,著有诗文集,为不忘祖籍四川陵阳,诗文集取名《陵阳集》,学者称陵阳先生。

牟巘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,《陵阳集》汇聚诗词、奏折、祭文、小品等多种文体。若细细读之,似乎每一篇都不是为文而文,而是因时而发,真切生动,让人感受到一个真切的州官形象站在你的面前。在《跋杜隐居墓铭》一文中,他说:“予假守武攸。”短短五个字,说明了他任职地点是在武冈。南北朝时,为避梁朝皇帝萧刚的“刚”字之讳,武冈被改

名为“武强”,隋朝时又改“武强”为“武攸”。于是在后来的历史中,武攸、武强均成了武冈的代称。除了“武攸”一词,在牟巘的《大士》一文中,他还使用“都梁”一词。两汉时,武冈曾被封为“都梁侯国”。因此,“都梁”也与“武攸”一样,为武冈的代称。

如果说,“都梁”与“武攸”还不足以确指是“武冈”,那么在《陵阳集》卷八中,一篇奏折的标题就是《武冈置靖安寨申省状》,正文一开头就说:“本军虽为僻垒,然西通融桂,北控沅靖,南连全永。”短短数语,将武冈的地理四至说得清楚明白。在《诣渠渡祠》一文中,讲述祭神时,他说“率僚吏躬至于庭”。由此可以确认,牟巘当时是武冈的主管领导。从祭文中可以看出,当时武冈大旱,“今亢旱已极,苗且槁死”“人心惶

惶,大命近止”。大旱之时,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,陷入了极度的困境,几乎到了无法活下去的地步。为请求“神灵”庇佑,牟巘来到武冈城西北二十里的渠渡庙,带领文武属吏,恭恭敬敬地肃立于庭,宣读祭文……

据当地村民传说,渠渡庙由来已久,是为祭祀渠渡神而修建起来的。庙初建于天尊山顶,求拜者甚多。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,庙里的神像来到了山脚下的平地上。村民说是渠渡神看到老百姓上山求拜艰难,所以才主动下山的,被感动的村民就在渠渡神立足的地方修建了新的庙宇。

在这篇仅一百五十来字的祭文中,牟巘又以自责的心情写道:“僦以吏为不职,则灾于其身,以塞咎异,以谢千里,吏之愿也。”也就是说,如果是因为我这地方主管的错误引起的干旱,那么就降罪于我这地方官吧,不要让老百姓跟着我受难。

牟巘的这篇祭文,为古代武冈十景之一的“渠渡晴岚”增添了别样的亮丽色彩。

(杨运焰,武冈市作协会员)